

戴维·马格里斯*

史晓林 译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文学为什么重要？

[内容提要] 本文是伦敦大学戴维·马格里斯教授的一篇文章。文章始于讨论为何他会在争议中将自己的终生职业从工程改为文学。他提出，文学当然并不能带来革命，但是文学有助于创造革命意识。因为文学通过一个具体的情境影响人的情感。虚构的经历、人物的行为和生活条件的情感反应，可以从小说中被模仿的世界转移到读者真实的生活现实中。尽管小说提供的体验是虚构的，但它产生的情感却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情感是对想象情境的真实反应，它们发生在真实的读者中，并且可以转移到现实世界。文学可以看成是对现实态度的实验。

[关键词] 文学；情感；革命

当我在大学把职业意向从工程改为艺术时，我的同事们批评了我这个决定，并劝告我应该做一些严肃的事情。从那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让人们相信艺术的确是严肃的，可以在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我想在这里探究为什么左派低估了艺术。

在西方文化中，影响对艺术的政治潜力持正面看法的主要障碍是因为经济提供了判断什么是有用的框架，且利润成为了主要的标准。在这个框架中，艺术则是暧昧的，是有些严肃的，因为它们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并且博物馆和剧院为英国带来了大量游客。有时，文学是可以盈利的：J. K. 罗琳通过《哈利·波特》摆脱贫困得到巨大财富的故事，抹去了诗人在阁楼上挨饿的形象。娱乐是一个数十亿的行业，电影和电视雇佣了很多，这带给他们一些“严肃”的地位。但文学呢？尽管商品化的艺术有着潜在回报，但文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严肃的生活完全无关的事——一种消遣。

我惊诧于，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也持有这样的观点。马克思选择和家人一起阅读莎士比亚度过时光，这种对文学持积极态度的事实虽不能证明文学的价值，但它应该使我们更容易持正面意见。当然，文学并不能带来革命，但革命更不能造就革命。文学有助于创造革命意识。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的和具体的东西是基础，因此它们比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更重要。第一个原则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一般进程。”人们对他们的世界的理解受制于这个过程：“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被动反映；它也会反作用于塑造它的结构。经济基础的改变产生了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变化，“司法、政治、宗教、美学或哲学——总之，在思想形态中，人们意识到这一冲突并与之进行斗争。”^①如果我们阅读马克思是为了理解革命，改变世界，那么我们不仅必须注意他对经济结构革命的看法，我们还必须关注到“意识形态中，人们意识到这一冲突并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能够理解文学可以是严肃的，因为它是意识到冲突的一部分且是潜在的武器。但怎么做？以何种方式？

*戴维·马格里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荣誉教授，研究兴趣为莎士比亚研究（最近一本出版的有关莎士比亚著作《莎士比亚的非理性结局：问题剧，2012》）、文艺复兴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以及高等文化与大众文化、环境问题与全球公平正义问题。

^①Karl Marx, Author's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 Handbook of Marxism*, ed. Emile Burns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35), pp.371-2.

找到一个清晰而连贯的答案很困难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因为文学的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

文学的本质是问题的一部分：它缺乏物理科学和经济学的精确性，它的影响及其原因难以表达。虽然你可以精确地说失业率已经上升了一定的百分比，但你无法精确地量化愤怒和焦虑产生的程度。马克思的格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取代对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必须被物质力量推翻，这相当明显；不过，他补充说，“但理论一旦掌握了大众，就会成为一种物质力量。”^①以性别平等为例，它现在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冲突领域，但年长的读者会记得，它曾被认为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它的决议会自动跟随社会主义革命而被边缘化。客观条件本身并不足以实现积极的政治变革。

教育，虽然看似矛盾，但也在保持对文学的社会潜力中发挥了作用。传统上（但目前仍然）教育体制强调理性和知识（考试制度比解释更重视事实）。反应、感觉和态度——主观性——非常服从理性。这种关系反映了审查者和雇主认可的价值。对主观性的压制也应该走向成熟。婴儿的哭可以是无缘由的，但成年人的感觉一定是受到理性限制的。孩子简单的“我想要”被权威的“合理”拒绝，并挤走。这种对理性服从的感觉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对于成年人来说，接受有情感成分的论点更加困难。愤怒和愤怒的话语——“房屋税是无耻、恶意、不公平的税收，可以淹没理性的声音——当面临着糟糕的住房短缺问题时，我们不能放纵别的人有额外的空间”。对结束童工这道制度的人道要求遭到抵制，不是承认工厂老板不关心孩子，而是以‘理性’的观点，没有童工，工厂就无法运转。这是价值观的选择，不是理性的证明。对“理性”的断言往往显得自我中心和不成熟。

这种对主观因素的拒绝不仅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它在英语教师中几乎同样存在。在文学的讨论中，感觉的从属关系的作用是把讨论集中在客观的要素上——什么可以被理性地讨论——这通常意味着关注情节，关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它的感觉如何或它意味着什么。或者，焦点可以放在技术上——例如莎士比亚构造图像的方式——而不是图像的判断。

即使我们承认，想象文学在政治上的潜力，更多的是在情感反应上，而不是在事实信息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情感反应本身并不是政治化的。与其他小说相比，出版商为米尔斯·布恩的《浪漫故事》每周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情感，但它的逃避主义不太可能重新回到政治上——它的关注点过于狭隘，过于倾向于迎合性别压抑。文学的积极的政治潜力不仅在于它产生情感，还在于情感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的具体经验联系在一起。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加入国际纵队之前，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本能。或者改变行为——但只有当它产生的情绪与现实相关联时，它才能做到这一点。^②

对虚构的经历、人物的行为和生活条件的情感反应，可以从小说中被模仿的世界转移到读者真实的生活现实中。尽管小说提供的体验是虚构的，但它产生的情感却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情感是对想象情境的真实反应，它们发生在真实的读者中，并且可以转移到现实世界。文学可以看成是对现实态度的实验。

另一方面，只关注文学的理性方面的问题出现在回应大学文学部门1968年的激进化。当然，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一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发现似乎让许多大学讲师感到惊讶。一些人认为，他们所教授的文学作品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教授实际的作品。他们不知道每种文化产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意识形态的；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的事实使他们变坏。很少有人倾向于研究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它是如何在个人作品中嵌入的。然而，他们教授文学理论，

^①‘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K.Marx and F. Engels, *On Religi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p. 50.

^②Christopher Caudwell, *Studies in a Dying Culture in Culture as Politics: Selected Writings of Christopher Caudwell*, David Margolies, ed.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p.8.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兴奋的激进。激进主义非常浅薄；一种没有实践的理论生产了那些引用法国理论家的观点，但对他们的应用却一无所知的学生。

相当矛盾的是，法国理论的接受（路易斯·阿尔斯塞的作品尤其如此）表现出了对“科学”风格的渴望。那种吸引并不是像物理或化学那样的实际的实验或硬科学，而是更多科学的形象——客观独立于个体观察者。它的表现形式可以在抽象的使用中看到，尤其是公式。将科学实践与艺术区分开来的一个特征是，结论是通过抽象来支持的，从扩展的例子中概括出来。对结论的接受部分依赖于其他实验的重现性，而这些实验证明了它们——单个实例不能作为证据。文学的“结论”是一种对现实的态度。情感的产生不是泛化的，而是具体的，它取决于具体实例的直接性。卡夫卡最著名的是（用英语）将一个年轻人变形成一只蟑螂，这是变形的起点。虽然这一事件与事实相去甚远，它只不过是一个假设的命题，但卡夫卡通过大量的具体细节创造了一种现实的感觉，虽然这些细节与它在昆虫学上的准确性无关。故事的情感控制依赖于它的具体性，这也暴露了卡夫卡自身资产阶级环境的关系。他创造了关于异化的最深刻的阐释，但它不是抽象的；他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细节，他让我们去感受，格里高尔的人际关系的好坏。无论我们是否认识资产阶级的模式，我们都有一种对异化的情感理解。

文学涉及到创造一些有经验的东西，而经验必然是特定的。但在几乎所有的教育中，我们都被鼓励给抽象和概括赋予更高的价值，而不是具体的经验。每当我遇到文学批评渴望超越具体的和具体的，我总会以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的结尾提醒自己，其中的情景是，垂死的葛莱恩被问是否感觉到疼痛：“我认为我的房间里存在疼痛”葛莱恩太太说，“但我不能说我真的完全感觉到了它。”

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有什么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共产党的高生产力时期，许多文化人物被共产党在抗击法西斯主义中的主导作用所吸引，文学被认为是斗争中的潜在武器。无产阶级的小说——无产阶级创作的小说，以无产阶级的观点，并服务于工人阶级——被认为具有推进斗争的潜力。一些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辩论，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涉及的目标不那么明确，也不那么直接。因此，虽然一些小说似乎是政治领域的动画，但其他一些小说似乎是作者的经历引起的政治共鸣。

作家的国际组织，左翼作家协会和其他想要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在党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934年，作家的国际组织在人民阵线精神的影响下创建了《左派评论》，以帮助制止法西斯主义和维护民主。它欢迎任何分享其观点的作家。因此，这个群体是多元化的，除了反法西斯的参与之外，没有遵循任何统一的文化理论。但是，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没有官方的共产主义文化政策，到1938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策已经成为了教条：无产阶级文学被要求采取激进路线，《左派评论》被关闭。

我们可以通过两位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优先考虑战斗性的影响。Walter Brierley在1935年出版了《经济情况调查员》和1937年Lewis Jones Cwmardy出版了《库玛地》。这两部小说都是以矿业界背景进行的，作者的政治潜力得到了认可。他们被鼓励让作品具有更明确的政治性，这是他们在第二部小说中所做的——布里利的《三明治人》（1937）和琼斯的《我们活着》（1939）。后来的叙述更侧重于当下的政治斗争，但他们却失去了第一部小说复杂动机的丰富描述。他们看起来很做作，好像他们的作者在遵循一种强加的议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这样的——而且他们的性格类型缺乏个性化和生命力使他们的第一本著作更有标志性。^①

在《经济情况调查员》中，故事内容很少是以叙事进行的。这一行动涵盖了一名长期失

^①Walter Brierley, *Means Test Man* (first published 1935; 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 1983).

Walter Brierley, *Sandwichman* (first published 1937; London: Merlin Press, 1980).

Lewis Jones, *Cwmardy* (first published 193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8).

Lewis Jones, *We Live* (first published 193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8).

业的矿工及其妻子和年幼儿子的生活。他们靠救济金生活，在周五的时候，当测试调查员要做每月检查时，焦虑便会增加；他们不断地意识到，调查员可以减少他们的收益，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艰难，难以忍受。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当英雄杰克失去了一个3d的比特，它是严重的。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现在无法买到的东西，而且还会让他们在家庭争吵。Brierley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仔细考虑每一笔交易的细节，还包括必须权衡每一分钱的潜在支出，以确保这些钱能持续到周末的羞辱和心理折磨。任何常规的购买衬衫纽扣、土豆、公共汽车等都需要仔细地考虑，并且会消耗情感能量。

然而，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挨饿，也没有无家可归，生活在街头。最大的痛苦是心理上的伤害。在这个社会中，社会认同和与他人的积极联系，甚至是对自己人性的感知都依赖于工作。简(杰克的妻子)觉得自己失去了体面，被当地人看不起，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去做那些正常工作的人做的事情，比如和朋友喝茶。杰克的痛苦与体面无关，但他的无用感是有腐蚀性的，当雇佣的矿工在上下班的路上经过时，他就会远离他的视线。当他带他的儿子去村里的板球比赛时，他很早就去了，以避免其他人看到他支付专为失业人员设置的优惠费用。简对杰克的态度是指责；他没有履行自己在社会上被赋予的角色，她也不愿意看到他也是受害者。虽然他了解她的态度，但他也很反感。更糟糕的是，他们必须花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去相互接触，这破坏了他们婚姻中的任何乐趣。

但比贫困的约束和受伤的自信更糟的是平均每月的经济情况调查。这是一种羞辱，因为他们的私生活被一个小官僚毫无规矩地、无情地衡量，对任何可能减少他们微薄津贴的事件都很警觉。

他们想让他赶紧弄好，快点走掉。家庭的主人和女主人——家里的两大支柱——在他们的城堡里的一对夫妇——英国人。这个人坐在桌子旁，那里曾经有一位朋友，总是在那一年的第一个星期天，离约翰最近的生日，过来这里喝茶聊天。这人坐在那些朋友所坐的地方，他就像耶和華，而站在他面前的他们瑟瑟发抖。不，那根本不是关系，这是没有灵魂的，冷酷无情的。经济情况调查。这是一种考验，它考验着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的存在，一个人的灵魂，每一次都变得更穷。(p. 263)

这幅画的精雕细琢说明的不只是过去比现在好；这张桌子上的朋友们过去常来的地方提供了过去的社会融合的景象与现在没有灵魂的审问的对比。Brierley通过对比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必要更加明确。他达到了一个“信息”和“情感”的点。检查不只是一项事务；场景中的一切都与它的历史、记忆和习惯产生共鸣，使之成为社会的化身。不管Brierley之前经受过什么样的不公正，调查员的访问给了他们客观存在的证明——杰克和简现在是“正式”的非人。

在这次访问之后，简非常的心烦意乱，语无伦次地抗议着羞辱他们的测试方式。Brierley通过杰克的回答提出了一个政治观点：

“如果英国所有的女人都能有一分钟的体验，体验你今天早上经受过的一切。再也不会这样的事了，也不会有更多的家庭感到不安。但仍然没有人能理解那些没有经历住这一切的人。”(p. 267)

Brierley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读者已经在想象中“经历了”；他们现在已经理解并感受到了经济情况调查的重量和意义。目前没有明确的政治要求，也没有呼吁立即采取“大罢工”或其他召唤立即采取行动。但是，通过具体地处理经济调查的对人类影响的复杂性，他已经明确了哪些价值观是重要的。对营养剥夺的统计数据可能会引发愤怒，但他们缺乏对Brierley情感重要的可视化。他展示了人类因某些条件而退化，而这些条件不是自然的，是资本主义强加的。

《每日工人》认为，这本书展示了失业者的痛苦，具有政治价值，但却对其缺乏政治阻力持批评态度：“一本揭示了失业者奋斗精神的书，将对工人阶级有更大的用处。”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可意识到的，是那些战栗着接受调查员审查的长期失业的工人不是常例，而只是例外。

评论者谦逊地说，这本书对“那些想要详细研究那些因经济情况调查更敏感的痛苦人群”是有好处的。Brierley和他的英雄被认为不适合真正的政治斗争。^①

在写于激进意见之后的那本《三明治人》(1937)一书中，Brierley给他的主人公赋予了更多的战斗精神，但却缺乏像《经济情况调查员》那样让人深刻理解的复杂情感反应。他的英雄主人公经历了更广阔的风光，在政治上和个人上都有更多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与布里埃利自己的生活有关，但没有个人发现的兴奋，也没有对《经济情况调查员》的细致入微的处理。书中人物的范围比第一本书要大，但很少有人试图培养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叙事的声音是无色的：

这个世界突然为了这个年轻人变慢；他无法分析向他涌来的浪潮。他知道它们与他的生活浪潮中的暴力紧紧缠绕在一起——被他的母亲，继父，南希，考试，坑——所困扰。这些都是实在的，这些事务在现实世界里等着他。这个地方(教育学院)根本不是真实的，它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假的东西。人类在这里，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自己，没有机会。(pp. 177-8)

《每日工作者》的评论家称赞它是一项信息丰富的作品；没有人表达对关心它的情感价值：

这本书是《经济情况调查员》的很有价值的后续。”。它告知了那些相信从工人阶级家庭到大学的道路已经变得很容易的人。这是一份社会文件，应该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②

Lewis Jones的《库玛地》，在同年早些时候出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每日工人》的热情欢迎：

这个故事是一个能够带领你的故事，因为你感兴趣，而且，确实，会深深地被里面的人物打动。他们也不是传统的角色。一旦登上舞台，他们不仅会说他们要说什么，而且会说更多。他们在生活中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富有，在书中他们并不代表一种态度，而是在你眼前成长……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③

这种有利的回应可能是对这本书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融入政治观点的认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教育小说——Lewis向我们展示了英雄的生命教育，Len，他从一个威尔士采矿村的童年成长到激进的成熟。这些章节都是跟随着他自我感知的发展阶段推进。孩子的天真提供给了社区和社会关系一种极好的、非评判性的看法。我们看到了Len对学校 and 权威的仇恨的发展，当他受到不公正的惩罚时，Lewis通过孩子的眼睛展现了他对开始工作和加入社会的渴望，同时也展现了他对采矿的美好想象，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毁。政治与个人反应的混合赋予了事件的意义。Lewis对他的英雄经历的描述具有即时性，由于内容是政治性的，所以回应具有政治意义。

当成熟的莱恩参与罢工时，Lewis继续提供不同的观点。矿工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目标，但在选择行动的过程中存在着矛盾和细微的差别——就像现实生活，而不是正确的政治行为模式——这鼓励了读者的复杂情感反应。

《我们生活》，Lewis《库玛地》的续集，出现在1939年。它也有政治指导的迹象，它吸引了那些认为它比《库玛地》更重视政治斗争的崇拜者。在1978年版的序言中，大卫·史密斯可能是最具个性特征的：

主要弱点是把每一件事都突显出来，因为它使刘易斯·琼斯把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变成了自动的抽象概念，其虚构的职责只是把历史的秘密泄露出去。

这种叙事鼓励了政治行动，但却无助于增进了解。John Sommerfield，他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激进小说《劳动节》的作者(1936)，1937年3月写信给《每日工人》，反对以作者的政治活动为评判标准的书籍。他说，《每日工人》是唯一一篇“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严肃对待书籍”的论文，“不应该鼓励具有误导性和有害的”革命感伤思想。^④

^①E. Woolley, 'Tortured Under the Means Test', *Daily Worker*, 22 May 1935.

^②B. L. Coombes, *Daily Worker*, 22 September 1937.

^③B. L. Coombes, *Daily Worker*, 22 September 1937.

^④*May Day* was republished by the RMT union in 2010 through the initiative of Marx Memorial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电影可能比文学更具有组织和聚焦情感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不经常被建设性地使用，这与其说是媒体的错，还不如说是工业所牵涉的的大量金钱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想判断艺术的政治潜力，例外是值得考虑的。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看过肯·洛奇的《我，丹尼尔·布莱克》(2016)。洛奇带我们穿越了利益体系的障碍、不公和羞辱。它有一种纪录片的价值，它展示了系统的细节，如果我们没有直接经历，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丧失和不公平。大多数人觉得它很能打动人。情绪反应得到了它的力量，因为实际情况是在具体细节中呈现的——没有描述，没有抽象，没有概括。每件事都有其特殊性，使它既紧张又真实。这部分是由于导演选择了他的角色和他的观众，这是特别强烈的，因为他让我们通过人物的眼睛看出来；我们跟随他们，对他们的处境作出反应，就好像我们真的参与了一样。例如，试图帮助丹尼尔的福利官员可能会被看作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但却得到了个人的回应。我们对一种类型的期望和军官的个性之间的差异给人一种更全面的感受，但更重要的是，它让人感到具体和真实。

一个小的段落，在情节上几乎是中立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丹尼尔在电脑上必须填写表格的尴尬局面。他说，他不懂如何使用电脑——铅笔是他的“默认”模式。当他被指示将鼠标移到屏幕上时，他会将鼠标放在显示器上。这就是整个电影主要的体验，他处于一种被迫的被要求做一些没有理解如何去做的境地，它似乎没有目标和与他的地位的现实无关。仅仅用情节来描述这一事件，就不能传达出这篇文章的情感意义和要点。丹尼尔并没有被残忍地对待，但是他的人性被漠视，对他的要求是矛盾的，这设置出来就是为了否认或推迟他的意愿。我们可以看到他被置于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他有一种不被意外事件动摇的尊严，但我为他感到尴尬。作为一个事件，它的内容很少，即它提供的信息很少，情节也不受其影响，但它有力地使人们的态度保持一致，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系统的邪恶上。它建立了社会团结的视角，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事件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部电影并不是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或者是抗拒的逻辑，而是它集中了我们的感受。它鼓励人们做出情绪化的判断，认为这个系统不仅设计糟糕，而且在人类看来，完全是腐朽的。这是观点的基本的重要性。丹尼尔的经验是一个有益的系统，应该被设计来帮助人们。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我服务的官僚主义，它轻视使用它的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需要。有敌对的官员，但也有同情的人，他们的好意被当作玩忽职守。人性的缺失不是源于个人的懒惰或恶意：它贯穿整个运作，因为它的基本原则否认社会责任——问题是系统性的。电影的视角是社会团结，它组织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并提供了隐含的判断原则。这种观点是可以举一反三运用的：我们之于《我，丹尼尔·布莱克》的体验鼓励我们以一种与大众媒体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现实。从理论上讲，它发展了对客观条件进行有效组织的主观意识。

这些客观条件，在2017年的这个时刻，包括一个摇摇欲坠的保守党政府。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破坏国家社会职能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保守党的选择是可以被拒绝的。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选择。1935年，Lewis把它放在历史的角度：

原始人类的主要工具之一。通过诗歌，原始人类以自我情感的表达，获得了对抗导致这些情绪的经济条件的力量。因此，它与我们的情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它对我们来说没有我们早期的祖先必要。^①

文学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方式来帮助社会做出改变。在更明显的显示方法中，通过让读者接触到不同的现实版本，文学应该使他们对其他人的理解 and 价值更加敏感。人们的观点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和经验的多样性形成的，而且他们所陈述的观点往往不能准确反映他们的实

Library's chair of trustees, Alex Gordon.

^①C. Day Lewis, 'Revolutionaries and Poetry' in David Margolies, ed., *Writing the Revolution: Cultural Criticism from Left Review*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 56.

际价值。从政治功能的角度来看，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复杂性，这将使我们更有能力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接触。如果文学只不过是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推销员，那么它必须被认为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在塑造我们想要的世界的愿景时，它是在积极地增加主观意识，那么，它必须被认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编辑：许诺晗)

Literature: Why is it Important?

David Margolies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article by Professor David Margol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why he would change his lifelong career from engineering to literature in disputes. He suggested that literature certainly does not bring revolution, but literature helps to create a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Because literature affects people's emotions through a specific situation. Fictional experiences, the behavior of characters, and the emotional response of living conditions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world that is imitated in the novel to the real life of the reader. Although the experience provided by the novel is fictitious, the emotion it produces is real. In other words, emotions are real responses to imaginary situations. They happen to real readers and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real world. Literature can be seen as an experiment of attitude towards reality.

Key words:

literature; emotion; revolution